

发达省份县域差异与极化的对比分析

——以广东、江苏两省为例

陈恩 余静静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广州 510632)

【摘要】: 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县域经济的发展潜力往往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潜力, 而差异和极化是反映县域发展程度和发展潜力的关键指标。以中国广东和江苏两省的县域经济为研究视角, 从差异和极化角度进行指数分析。结果表明, 江苏县域经济水平显著高于广东, 差异和极化程度也高于广东; 指数区域分解显示, 江苏的县域差异主要由区域间差异造成, 而广东则主要由区域内部差异造成; 利用基尼系数分析三大产业结构对区域不平衡程度的贡献度发现, 两省均是第二产业对差异贡献度最大, 第三产业次之。

【关键词】: 县域经济 广东 江苏 差异 极化

【中图分类号】: F127;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9)04—0030—07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国家不再过度注重经济增长速度, 而更关心经济质量、效益是否得到提升, 这也是经济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 就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为沿海开放重要发达省份的广东和江苏, 虽然经济总量名列前茅, 但是区域差异问题同样显著。2016 年底,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10.69%, 连续 28 年居全国首位。与此同时, 江苏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10.20%, 紧追广东之后。两省经济总量不断提升的同时, 区域内部经济差异和县域间差距问题也日益凸显。据两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6 年珠三角、东翼、西翼、山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为 3.58 : 1.07 : 1.28 : 1, 珠三角经济发展实力显著高于东西两翼和山区。而在笔者分析的广东 57 个县级市、县、自治县(以下统称县)中, 高于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33147 元的县有 23 个, 全部低于广东省人均水平(72787 元/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是珠三角的四会市(71863 元/人), 其值是最少的位于山区的五华县(12968 元/人)的 5.54 倍; 而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比值为 2.23 : 1.55 : 1, 其中 41 个县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 83117 元, 高于县域平均水平的有 14 个县, 高于全省平均水平(95257 元/人)的有 13 个县, 9 个位于苏南地区, 剩余 4 个均位于苏中地区, 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最高的是苏南地区的昆山(191058 元/人), 其值是位于苏北地区的灌云县(40926 元/人)的 4.67 倍。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 广东、江苏两省均面临区域差距过大的难题, 而且广东整体县域发展远远不及江苏。

虽然同为改革开放中脱颖而出的经济强省, 粤苏县域经济发展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众多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中, 江苏县域经济表现亮眼, 而广东县域经济则差强人意。其中, 2018 年百强县榜单中, 江苏不仅数量最多达到 23 个, 而且独揽前四, 而广东仅有四会市上榜且排名靠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和极化过大问题将成为阻碍整个区域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由于发展基础、资源要素、政策偏向等原因, 不同地区发展进度不同, 县域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若地区的快速发展导致差异过大从而产生极化, 则会使社会不公平加剧, 导致社会不稳定, 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 笔者将利用指数分析, 从生产、生活两个方面对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的差异和极化进行比较, 分析两省区域波动差异, 结合产业差异贡献程度, 深入探究发达省份背后县域不

均衡发展、影响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潜在因素。

二、文献综述

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经济不仅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还是区域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础;县域经济既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备的经济单元,又是构建地区经济、城市群等区域的基础。所以县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潜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与发展潜力^[1]。

同为中国沿海重要对外开放省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脱颖而出的广东和江苏,经济发展经常被人们作为省域或区域发展比较研究的典型案例。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倾向于对两省经济发展指标进行数量上的增长比较分析^[2,3,4],少有学者对两省县域经济进行探讨,何承文^[5]利用 2015 年的数据分析认为,无论是总量还是平均水平,江苏县域经济都远远高于广东,但江苏内部差异巨大、两极分化严重,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整体较为均衡但个体水平较低;更多学者主要研究广东或江苏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情况,如周春山等人^[6]研究发现,1990 年以来广东县域经济差异在逐年增大,并且越发达的地区差异越大;罗必良等^[7]认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的动态变化过程,而第二产业发展的不均衡对总体县域经济差距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有学者通过基尼系数的分解发现,江苏区域经济差异总体上呈波动性的扩大趋势,且差异主要受一般县市经济差异的影响^[8];而黄雪琴等^[9]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差异的扩大主要来源于南北区际差异,区际差异主要是南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这种差异又完全来自二、三产业发展差异。

由于广东改革开放时率先实施先行先试的策略,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尤为突显,经济增长主要由珠三角带动,而发展滞后的县域大都集中在东西两翼和山区,这使得县域经济整体水平不高。江苏省虽然也面临区域内部差异过大的难题,但统计数据表明 2016 年经济总量超过千亿的县就有 8 个,这看上去“实力悬殊”的对比是否某种程度上表明江苏县域发展前景可观,广东县域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在众多学者关注两省县域经济发展现状时,却很少有人分析两省县域经济极化现象。区域经济极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中间阶层消失”或者向“两极周围聚集”的现象^[10],最明显的体现是社会实体内贫富差距扩大,而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紧缩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较大的影响。相对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国内关于极化现象的研究起步虽然较晚,但也逐渐意识到其重要性^[11,12],欧向军等^[13,14]通过建立相关指数模型探讨江苏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演化过程;甄峰等^[15]则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极化和反极化的演变。

现有文献较少对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的差异和极化进行比较,通过对两省差异和极化现象的研究,不仅可以了解两省县域发展现状,也可以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比较两省未来发展潜力,还可以为有效缩小县域发展差异、简化经济极化程度、促进县域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议,因此,笔者将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对两省县域经济进行比较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研究思路

由于两省历年县域划分都有改变,所以笔者以 2016 年底县级市、县、自治县(以下统称县)为标准,对江苏省 41 个县、广东 57 个县进行比较。以往研究中,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评估地区经济富足程度和总体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笔者继续引用该指标来测算生产水平上的差异与极化。县域经济最典型的表征是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是提高农民收入^[16]。因此,在比较县域经济差异时不可避免要考虑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笔者分别采用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作为衡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笔者进一步按照惯用的经济区域划分将江苏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广东划为珠三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大区域,分析各区域间的差异以及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以揭示区域波动变化特征。由于产业结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产业发展差距也会对区域差距变化产生影响^[17,18],所以,利用各产业人均增加值测算基尼系数,以此分析三次产业结构对区域发展差距的影响。文中所有数据均来自广

东、江苏两省及地方各市 2001—2017 年的统计年鉴。

(二)研究方法

在测算县域经济差异和极化时,笔者分别采用了泰尔指数(T)和崔-王指数(TW);在比较区域差异和极化时,由于泰尔指数可以按照地理构成进行分解,所以,利用其对县域差异进行空间分解,而崔-王指数虽然可以反映县域间是否存在极化现象,但却不能很好地解释哪些区域发生了集聚和极化,所以进一步引用坎贝尔-张指数(KZ)^[19]对区域间的极化现象进行描述,计算公式如下:

$$T = \sum_{i=1}^n x_i \log(u/y_i), \quad (1)$$

$$TW = \frac{\theta}{N} \times \sum_{i=1}^n p_i \left| \frac{(y_i - m)}{m} \right| r, \quad (2)$$

$$\begin{aligned} T &= BT + WT \\ &= \sum_r \frac{Y_r}{Y} \times \log \left[\frac{(Y_r/Y)}{(P_r/P)} \right] + \sum_r \frac{Y_r}{Y} \times \left\{ \sum_{i=1}^n \frac{Y_{ri}}{Y_r} \times \log \right. \\ &\quad \left. \left[\frac{(Y_{ri}/Y_r)}{(P_{ri}/P_r)} \right] \right\} \end{aligned} \quad (3)$$

$$\begin{aligned} KZ = \frac{BT}{WT} &= \sum_r \frac{Y_r}{Y} \times \log \left[\frac{(Y_r/Y)}{(P_r/P)} \right] \div \sum_r \frac{Y_r}{Y} \times \left\{ \sum_{i=1}^n \frac{Y_{ri}}{Y_r} \times \log \right. \\ &\quad \left. \left[\frac{(Y_{ri}/Y_r)}{(P_{ri}/P_r)} \right] \right\} \end{aligned} \quad (4)$$

(1)式~(4)式中:i表示i县,r表示区域,n表示县的个数, x_i 表示i县人口占所有县的人口比重, y_i 表示变量指标值,u是所有县的人均变量指标值,m是人均变量的中间值, p_i 是i县人口, Y_r 是r区域生产总值, Y_{ri} 是r区域i县的生产总值, $\theta=1$, $r=0.5$,BT为区域间差异,WT为区域内差异,其中,T指数和TW指数的值均在0和1之间,越接近1就表明差异和极化越大。由于某些县的发展在平均水平以下,所以,公式1可能为负,考虑到泰尔指数反映县域差距,所以对公式1中出现的负值取绝对值。

虽然基尼系数一般被用来分析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但是在进行国民收入核算时,由于可以根据三次产业增加值核算出当年的GDP水平,所以可以将基尼系数也按产业进行分解,分别计算三次产业的基尼系数,并根据各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确定其权重,加总得到总基尼系数^[20, 21, 22],计算公式如下:

$$G = \sum (S_{kt} \times C_{kt}) \quad (5)$$

$$C_t = (2 \times \sum_{i=1}^n i \times y_{it}) / (n \times \sum_{i=1}^n y_{it}) - (n+1)/n. \quad (6)$$

其中, G 代表区域总的基尼系数, k 取值为 1、2 和 3, 分别表示第一、二、三产业; S_{kt} 代表第 k 个产业在 t 年的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其值相当于各产业基尼系数的影响权重; C_{kt} 表示第 k 个产业在 t 年的基尼系数, 反映该产业在该区域分布的差异情况, 取值越大, 该产业的区域空间分布越不均衡。 y_i 表示第 i 县某一产业的人均增加值, 在计算过程中需要对样本值进行从小到大的排序, 即 $y_1 \leq y_2 \leq \dots \leq y_n$ 。

(三) 广东、江苏两省差异和极化过程分析

1. 广东、江苏县域经济生产水平差异与极化过程分析

泰尔指数和崔-王指数测算的 2000 年以来, 广东、江苏两省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化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 2000—2016 年, 广东、江苏两省县域间生产水平的差异和极化总体均是下降的。江苏县域差异由 0.3032 下降至 0.2082, 极化程度由 2000 年的高极化水平 0.7275 微弱下降至 2016 年的 0.6939。而广东县域差异与极化均远远小于江苏, 整体下降速度也明显慢于江苏, 县域差异轻微的由 0.1619 下降至 0.1371, 极化程度则由 0.5751 下降至 0.4937。

具体来看, 从 2000—2005 年, 江苏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是逐渐上升的, 之后才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极化程度在 2008 年前是不断攀升的, 最高值达到了 0.9382, 极化现象严重, 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值得注意的是, 县域经济的差异与极化进程变化趋势虽然相似, 但是差异的下降并没有立即引起极化的减弱, 相反极化仍会在缓慢扩张后才逐渐下降, 且弱于差异下降幅度。与江苏相比, 广东省县域差异和极化程度较低, 波动较为平缓, 整体呈微弱的下降趋势。而江苏县域发展水平虽然整体高于广东省, 但极化程度过高会造成贫富差距过大, 2016 年江苏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千亿的县有 8 个, 而生产总值没超过 500 亿的高达 16 个, 最低只有 241.88 亿, 仅为昆山 3160.29 亿元的 1/13, 严重的极化现象为江苏县域未来发展埋下较大隐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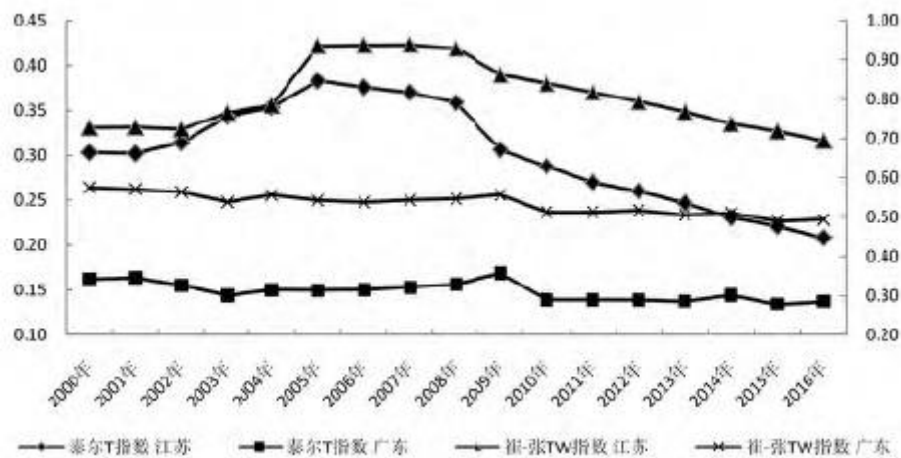


图 1 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差异与极化

2. 广东、江苏县域经济生活水平差异与极化态势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 发展差距问题也日益凸显, 并逐渐成为制约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城乡差距涵盖收入、医疗、教育等多个方面, 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收入差异过大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缺乏效率, 还会使收入呈现两极分化, 造成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 笔者选择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 利用泰尔指数和崔-王指数算出的城镇和农村生活水平的差异和极化过程。

分析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指标可看出,2016 年江苏县域经济差异和极化程度分别是 0.0642 和 0.3723,广东县域经济差异和极化分别是 0.0440 和 0.2819,虽然与 2000 年江苏的 0.0606 和 0.3195,广东的 0.0406 和 0.2808 相比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是两省的差异和极化整体上均呈倒 U 形。江苏县域差异于 2006 年达到峰值 0.1004,而当人均工资差异在 2013—2014 年有轻微上升时,极化现象也有同样的反映,说明极化往往会随着差异的扩大而扩大;而广东人均工资差异和极化呈现几乎完全一致的变化趋势,均于 2011 年达到最大值 0.0729 和 0.3675,之后则不断下降。

在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方面,虽然江苏整体县域差异和极化均由 2000 年的 0.0803 和 0.3713 上升至 2016 年的 0.1046 和 0.4099,但具体呈现上升到下降的发展过程,差异在 2007 年达到峰值 0.1136,之后一直是广东的两倍多,极化程度与广东差距不大;而广东县域差异和极化波动较多,总体呈 M 型,差异和极化程度均由 2000 年的 0.0565 和 0.3344 微弱下降至 2016 年的 0.0522 和 0.3235。

总体上看,江苏县域经济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上优于广东,虽然差异与极化程度均高于广东,但是两者差异不及生产水平的差异和极化大。从表 1 还可以看出,虽然两省县域城镇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极化与 2000 年相比均是轻微上升的,但是农村收入差异和极化程度明显大于城镇工资差异和极化,这说明在生活方面,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衡上,而且江苏农村不平衡程度超过广东。

3. 广东、江苏区域差异与极化现象分析

虽然泰尔指数和崔-王指数反映了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差异和极化演变,但是却不能解释哪些区域发生集聚、哪些地区的差异对整体差异起到推动作用。所以进一步利用泰尔指数的分解和坎贝尔-张指数,将广东县域分为四个区域,江苏划分为三大区域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江苏无论是三大区域间的差距还是区域内部差距,2000—2004 年均呈现上升态势,之后便不断下降,其中区域间差距从 2000 年的 0.1051 下降到 2016 年的 0.0507,下降了 50%,与此同时,区域内部差异在 2000 年由 0.0268 上涨到 2004 年的 0.0356,之后便一路下降至 2016 年的 0.0128。反观广东四大区域间的差距波动较多且缩小并不明显,仅由 2000 年的 0.013 下降到 0.009,而区域内部差异甚至从 2000 年的 0.0470 上升至 0.0543。上述数据说明,江苏区域间差距较大而区域内差距较小,广东则恰恰是区域内部差异更为突出。由于反映极化水平的 KZ 指数是通过区域间差距与区域内差距的比值得来的,所以江苏区域极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广东:2000 年广东、江苏两省的极化程度分别是 0.2769 和 3.9288,到 2016 年,江苏上升到 3.9544,广东下降到 0.1667。

在江苏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区域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度最高曾达到 2007 年的 83.25%,而区域内的差异只在 20%左右。这表明江苏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主要是由三大地区间差异造成的,区域间极化现象严重。而广东区域间的差异整体上不断下降,最低只有 11.71%,这也表明区域内巨大的差异在广东总的差异中占较高比重。由于广东最发达的地方集中在珠三角,而珠三角发达地区很少设县,广东更多的县集中在东西翼和山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差别不大。

江苏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的差异,而广东则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在进一步对区域内差异进行分解后可以看出,广东落后的山区内部经济发展最不平衡,对区域内部差异的贡献度达到 60%以上,虽然近几年有下降态势,但是与 2000 年相比,仍处于较高差异贡献水平,而珠三角、东西翼区域内差异贡献度较低且不断下降。作为江苏发展最好的区域,苏南地区的内部差异也是三大区域中最大的,贡献度从 2000 年的 11.93%上升至 2016 年的 14%,苏中地区则缓慢波动上升至 3.49%,只有苏北地区的差异是缩小的。这说明江苏不仅三大区域间差异较大,而且发展最迅猛的苏南区域内部差异也很显著:2016 年苏南地区的昆山市生产总值 3160.29 亿元,是江苏县域中最高的,而同属于苏南区域的句容地区生产总值只有 493.2 亿元,昆山是其 6 倍多。这意味着江苏发展最好的县域虽大都集中在苏南,但并没有发挥其扩散效应,苏南部分县域以及苏中、苏北地区发展现状并不乐观。

4. 广东、江苏县域经济产业结构的差异分析

将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的各产业人均增加值进行分解,得到的总基尼系数显示,广东、江苏两省县域经济差异总体都处于不断下降的态势。虽然江苏县域差异始终大于广东,但是差异缩小速度却快于广东,从2000年的0.4293下降到2016年的0.3054,而广东仅由0.2738缩小至0.2476。从各产业的基尼系数看,两省都是第二产业的基尼系数最大,说明各县间第二产业发展最不平衡。其中,江苏第二产业差距在2004年达到最高0.5669后便逐渐下降,而广东则是自2000年0.3912开始一直下降,到2016年两省第二产业系数均在0.3左右。三次产业中,江苏第一产业基尼系数虽然最低,但呈逐渐增加的态势,始终在0.16附近;而第三产业发展不平衡程度却从2000年的0.4519逐渐下降至2016年的0.2988。广东县域第一产业不平衡程度不仅始终大于江苏,而且在2007年以0.2235超过自身第三产业0.2137后,一直波动上升。

虽然三次产业在两省县域中差距情况相差不大,但是由于各产业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不仅受到自身基尼系数大小的影响,还受到各产业产值份额的影响,因此,对区域经济总体差距的贡献度会有显著的差别。由表4可知,两省均是第二产业对区域经济差距贡献最大,并且广东第二产业贡献度近年来仍处于上升态势,由2000年的47.32%波动上升至2016年的48.42%,而江苏在2005年最高达到63.57%后不断下降至52.31%。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由于在区域间的分布不平衡,使得两省第三产业贡献率均稳健上升,分别由2000年的29.34%和35.68%上升至34.54%和43.71%。基尼系数虽然显示两省第一产业不平衡程度逐年增加,由于其在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小,对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力也小。其中,江苏第一产业贡献率低至4%左右,远远低于广东第一产业贡献率17%,而且第二、三产业逐渐接近的贡献率表明,江苏省产业结构优化程度高于广东。从变动趋势可以看出,江苏第一、二产业贡献率不断下降,第三产业缓慢上升,说明各县域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江苏区域差异的关键因素。而广东各县域虽然第一产业贡献率最低,但是所占比重仍不小,而且第二产业贡献率近年来也在上升,说明广东县域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发展不成熟阶段。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分析表明,江苏县域经济差异无论是在总基尼系数还是生产、生活指标方面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极化现象往往会随着差异的扩大而不断加深,但后期即使差异平缓下降,极化趋势并没有立即缩减而且之后的下降速度也弱于差异下降速度。自21世纪以来,江苏苏南地区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有利形势,抓住了外来资本和产业加速向长三角转移的新发展机遇,外向型经济飞速发展带动经济腾飞,使得苏南发展与苏中、苏北差异扩大。随着江苏省政府对区域差距问题的重视,以其雄厚的财政实力大规模支持苏北发展,为区际产业转移、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使得县域差距自2005年开始呈现缩小趋势,再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对严重依赖外部经济的苏南冲击较大,使得苏南、苏中、苏北间差异逐渐缩小。

与江苏县域经济发展特色不同,广东县域经济发展,除城镇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差异和极化处于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外,总基尼系数、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常住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异与极化过程都处于波动状态,且整体下降幅度较小。虽然广东省政府一直致力于协调内部发展,但由于东西两翼、山区聚集了大部分的县,而这些地区区位优势不佳、财政资源缺乏、缺少发展资本,使得差异缩小的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县域差异还是极化程度,广东均小于江苏,主要原因是广东大多数县域位于山区,自然环境、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产业结构均相差不大。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广东、江苏两省县域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差异较大,而且江苏农村不平衡程度超过广东。根据泰尔指数分解可以发现,广东区域差异主要是由区域内差异造成的,其中最落后的山区对差异贡献度最高。说明广东要想缓和区域差异的矛盾,需要加大对落后山区的建设力度,提高山区发展水平;而江苏则恰恰相反,差异主要是由三大区域间差距造成的,其中,发展最快的苏南区域内部差异对总差异贡献最大。说明江苏苏南地区的昆山、张家港、江阴等在发展过程中抓住机会获得了竞争优势,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发挥扩散效应,以此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导致内部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分解产业结构的结果显示,虽然两省均是第二产业最不平衡,第三产业次之,但广东第一产业差异程度远大于江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明显低于江苏。

在中国经济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广东和江苏要想继续保持领先的发展地位,必须认识并解决自身发展的不足。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其发展差异与极化过大都会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笔者主张采取相应措施来更好地解决广东、江苏县域发展问题:第一,作为我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优质资源、技术、人才等都过多集聚在珠三角,

导致东西翼、山区缺乏发展所需动力。目前,珠三角忙于转型升级,东西翼、山区资源、土地、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始显现。各县域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体制改革、完善优惠政策、营造良好氛围,鼓励本地能人在本地投资、发展本地经济的同时,应加强对外来资金的吸引力。不同的县域有不同的发展轨迹,应针对不同县域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制定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在发展过程中,既要借鉴江苏、浙江等县域经济迅速发展的经验,也要学习广东增城、顺德等地的发展模式。第二,县域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要想进一步提升县域发展层次,必须解决县域间差异与极化过大的问题。苏南受外部市场影响较大,需要大力培养内源性经济,加强创新。一方面,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利用江苏高校资源众多的优势,促进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战略结合,努力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对于苏中、苏北欠发达县域,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吸引科技、人才等要素的集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地区间的共建共享。

参考文献:

- [1]姜文仙. 广东县域经济的制约因素与提升对策[J]. 广东经济, 2015(5):69-75.
- [2]金子琰,黄晓莹,马瑄忆,等. 粤苏两省经济发展质量比较研究[J]. 广东经济, 2017(4):69-77.
- [3]杨少浪,赖晓燕,罗青兰.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再创广东发展新优势:加入WTO十四年:粤苏经济发展比较分析和思考[J]. 广东经济, 2016(7):50-62.
- [4]程鹏,柳卸林. 外资对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研究:基于广东和江苏的实证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10(9):78-88.
- [5]何承文. 县域经济比较研究:以广东、江苏为例[J]. 广东经济, 2018(3):89-92
- [6]周春山,王晓珊,盛修深,等. 1990年代以来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研究[J].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1, 30(2):27-32.
- [7]县域经济课题组,罗必良,胡新艳,等.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分析与策略选择[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5(4):1-14.
- [8]蔡安宁,庄立,梁进社. 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测度分析:基于基尼系数分解[J]. 经济地理, 2011, 31(12):1995-2000.
- [9]黄雪琴,汤琰,凌亢.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的统计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09(9):21-27.
- [10]Esteban, J. and Ray, D. On the Measurement of Polarization[J]. Econometrical, 1994, 62(4):819-851
- [11]洪兴建,李金昌. 两极分化测度方法述评与中国居民收入两极分化[J]. 经济研究, 2007(11):139-153.
- [12]胡培兆. 共同富裕与良性两极分化[J]. 理论前沿, 2003(22):27-29.
- [13]欧向军,顾朝林. 江苏省区域经济极化及其动力机制定量分析[J]. 地理学报, 2004, 59(5):791-799.
- [14]欧向军,叶磊,张洵,等.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极化比较[J]. 经济地理, 2012, 32(7):24-29.

-
- [15]甄峰, 沈建法.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空间极化研究[J]. 地理科学, 2000, 20(5): 403-410.
- [16]罗必良. 增城模式: 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7(4): 30-42.
- [17]刘元春. 经济制度变革还是产业结构升级: 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源泉及其未来改革的重心[J]. 中国工业经济, 2003(9): 5-13.
- [18]江小涓.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新阶段和新任务[J]. 财贸经济, 2005(4): 3-9.
- [19]Zhang, X. B. and Kanbur, R. What Difference do Polarization Measures Make? An Application to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37(31): 85-98.
- [20]刘艳, 王学力. 1979-2012 年广东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动态演变与产业分解[J].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4(4): 87-91.
- [21]Fei J, Rains G, Kuo S. Growth and the Family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y Factor Component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 92(1): 17-53.
- [22]张云峰, 曹冲. 江苏沿海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产业分解研究[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142(2): 75-82.